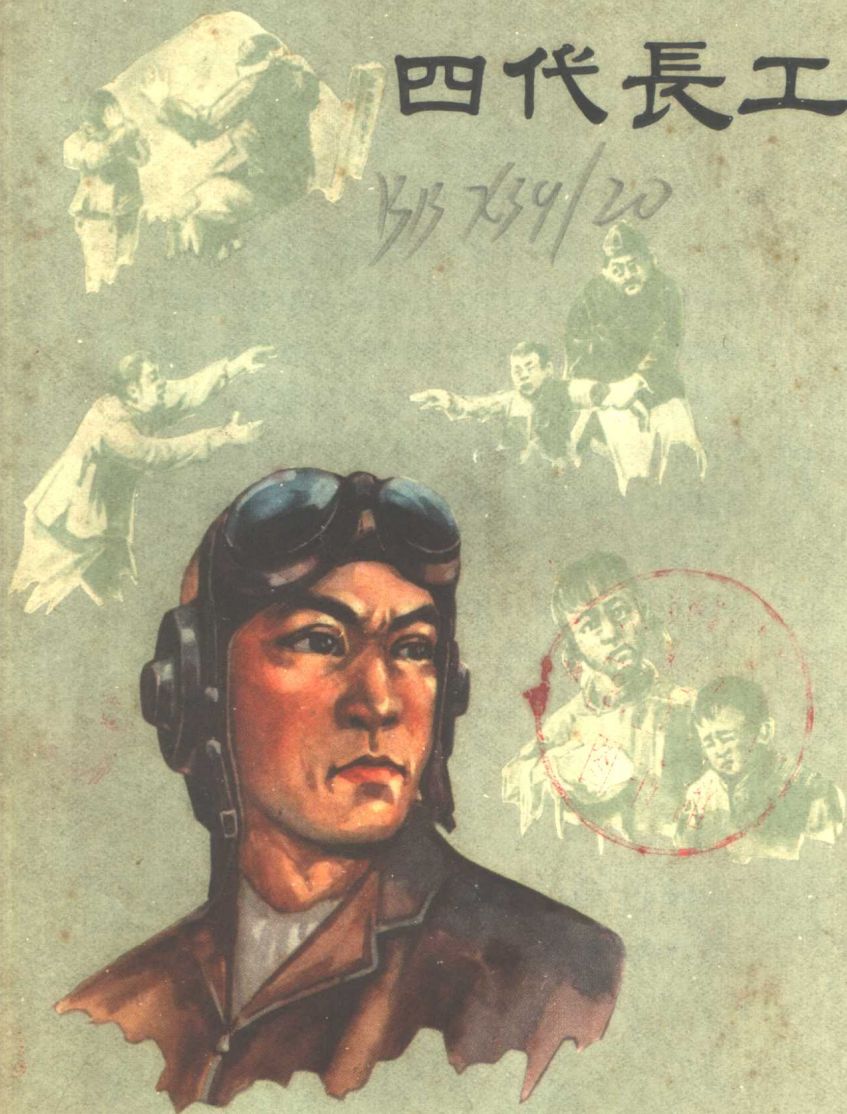


工長代四

133 739/20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翻印

目 录

四代長工.....飞行大队长 王 江 (1)

苦难的童年.....飞行中队长 沈炳芳 (10)

我們家的一次忆苦思甜会.....飞行员 馬子忠 (19)

一張卖身契.....飞行员 張兴政 (30)

永远不能忘記的阶级仇恨

——記飞行员黃育光苦史.....家史走訪小組 (38)

四 代 長 工

七一六三部队飞行大队長 王 江



去年十月六日，是我一生中怎么也忘不了的日子。那一天，天格外的晴，风格外的暖，人格外的亲。就在这一天，我见到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。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，毛主席微笑着向我們招手。我拚命地蹣着脚，

目不轉睛地望着他老人家，幸福的泪水一个勁地往外流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我想了很多事情，想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也想到了在旧社会我那当了四輩子長工的一家。

我的老家是山东省宁津县。但在旧社会，这个富饒的地方却容不下我們穷人。我的曾祖父挑着担子，帶着曾祖母和祖父逃荒来到黑龙江省海倫县。可是，这里也同样沒有穷人的活路。曾祖父給地主当了長工，整天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，还是活活地餓死了。曾祖父死后，祖父接过曾祖父的鋤

头，又繼續給地主扛活，在他累死的时候，家里只有兩間夏不遮雨，冬不擋風的破草房，撇下我的奶奶、父親和叔叔。

我父親剛滿九歲，又披上祖父留下來的破麻袋片，開始給地主牛升當半拉子。父親白天放牛、下地，晚間喂豬、喂馬，可却吃不上一頓飽飯。向他們要一點，地主婆惡狠狠地說：“小孩子家，吃那麼多干什么！”一次，父親餓得實在抗不住了，燒了一穗苞米，被地主牛升看見後，掄起木棒就是一頓毒打，打的時候還不准哭叫。父親給地主牛升當了兩年半拉子，兩年的工錢只給了七十斤苞米碴子。我父親那時只有一個願望：自己快點長大。

父親長大了，十四年的長工生活過去了，自己的腰累彎了，地主的地更多了，而等待着的災難却數不盡——就在他二十三歲那年，又被日本鬼子抓去當了勞工。

父親一走，家里只剩下瘦弱的母親、才下生的弟弟和四歲的我，生活就再也過不下去了。我們只好離開張振屯搬到海北鎮我的外祖父家。外祖父也窮得什麼都沒有，他是個鰥孤的老人，每天早晨扛上一草把糖葫蘆出去，走遍大街小巷。如果賣的多，他就用扎腰用的包袱皮買回二斤苞米面，如果沒有賣過一半，他就什麼吃的也不能買，只有一個人在深夜里默默地準備着第二天的生意。外祖父連自己都養活不了，哪有能力顧得了我們啊！母親整天給財主打零工也糊不上我們母子三人的咀，我和弟弟在家里常常餓得直哭，遇上這個時候，母親就端上瓦盆，領着我們到街上去討點稀粥墊墊飢。

過年了，有錢人家殺豬宰羊，我們家却揭不開鍋。我站在門坎上大聲地喊：“爸爸呀，爸爸，你什麼時候回來

啊！”那时我天真地想：“如果爸爸回来，我們就可能吃頓飽飯了。”母亲一把把我拉到她的怀里，抽泣着叫着我的小名儿說：“大奎，日本鬼子不放你爸爸回来啊……。”

果然，父亲一去六年沒有音信。一天，我从外面打柴回来，突然不見了母亲。我跑到村东面的山坡上，只見母亲趴在外祖母的墳上嚎啕痛哭，我跑上去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；



“媽，你別难过，爸爸会回来的，会回来的。”母亲一串串的泪珠洒在我的臉上，对我說：“奎儿，跑回来的人听說你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在外边啦……。”

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象一盤烏云压在全家人的头上，母亲几天不吃不喝，家里的苦日子更加过不下去了。为了弟弟不致餓死，为了全家找条生路，母亲不得不把我交給奶奶，帶着弟弟改嫁了。

我終生难忘同母亲分别的时刻。那一天我死死地抱住母亲的腿，叫着：“媽媽，你把我帶走吧。”母亲和我抱着

痛哭，她不断地叮咛我：“奎儿，不是媽媽不要你，是人家不准，我走后，你跟着奶奶，听话，别想媽……。”說着母亲就被人拉上了車。天阴沉沉地刮着冷风，我追出門外，車已經走远了。万惡的日本帝国主义，万惡的旧社会，逼得我們骨肉分离。从此，我成了一个孤儿，只有在睡夢中才能見到自己的母亲。

第二天我就随奶奶到了王貴屯叔叔家。叔叔在那里給地主扛大活，成年累月当牛做馬，同样是吃了上頓沒下頓，一家人只有一条破毯子。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，按母亲的卖身价，人家不再养活弟弟了，叔叔把弟弟接了回来。当时我非常高兴，有了亲弟弟和我在一起干活，再不那样孤單了。弟弟那年六岁，經常光着屁股跟我上山打柴，到地边挖野菜，我常給他掏老鴿蛋吃。

弟弟回来半年，我生了麻疹，他一步也不离开我。可是在我病好以后，他却病倒了。家里哪有錢給他治病啊，眼望着他的病一天天严重。他发着高烧，在昏迷中哭叫着“媽媽”，他喊一句，嬭子就噙着泪答一句，我看着弟弟，心疼得都要跳出来。突然弟弟伸出小手吃力地說：“哥哥，我餓啊……給我掏几个老鴿蛋吃吧。”我不知怎么是



好，孀子抽泣着跑出去給他借雞蛋。但是在她回來時，我的弟弟已經嚥气了。弟弟死時身上仍然是光光的，沒有一絲布條，只得用谷草把他裹出去了。弟弟死后，奶奶哭瞎了两眼，不久就悲憤地離開了人世。叔叔時常想念親人，也精神失常了。

那時我十二歲，財主家的孩子正背着書包上學，我却拿起鞭子到地主許有家放牛了。我過去聽說在大地主家干不好活，說打死就打死，原想到这个小地主家会好些。其实，大小地主一样狼心狗肺。我去時講好供吃供穿，上冬了，我要双鞋子穿，他們却說：“你的工錢連吃飯都不够，哪来的錢买鞋！”還說什麼：

“牛不吃夜草不肥”，逼着我早早起来放牛。在冰霜严寒的冬天，我还赤着脚，脚冻得象針扎一样痛。实在冻得不行，我就趴到牛身上取暖。有一次被許有看見了，他一把將我从牛背上拉下来，拿起一根柳条狠狠地抽我，一边抽一边罵：“臭牛拉子，你趴到牛身上，牛还能吃飽嗎！”我怕挨打，再也不敢上牛身上了。干了一冬天，脚全冻爛了，他們就把我攆了出来。



我走在风雪刺骨的街上，碰到了貧农張四奶奶。她把我

拉到家里，看着我前露胸后露背的破棉襖和那双爛蘿蔔似的脚，泪珠漱漱地掉下来，咀里不住的叨唸：“孩啊，可憐的孩啊！”可是她家也是穷得連根綫头都沒有，只好搓了根麻繩給我把破棉襖縫上，又把她儿子的旧靴給了我，我这才算有了双鞋。

第二年，我又到地主朱子璋家当半拉子。我明知道他更惡毒，可不去又到哪里去呢！他家長工吃飯也分两等，我和放猪的要等到最后吃，剩下点，就填到肚子里，不剩下，就得挨餓。就这样，他还瞪着馱眼說：“不愿干就回家去！”說是半拉子，同样是干整活，別人判一壠，我也要判一壠，苦水往肚子里咽。

轉过年来，我又到了地主涂景元家。地主的心真是一个比一个黑，一个比一个毒！一天涂景元的老婆笑嘻嘻地对我說：“看把你冻的那个样，眼下沒有錢給你扯衣服，先把这件棉襖拿去穿吧。”我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她姑娘的破花棉襖，当时气的真想罵她几句，可又想：“已經上秋了，不要，穿什么。”我只好不男不女的，常常遭人譏笑。等到打完了場，棉襖全飞了，我也連冻帶累病倒炕上。涂景元看到我一时不能好，等好了，活也干完啦，就又攆我走。我一賭气下了炕，拿起我仅有的一块小木枕头，准备和其他長工們告別，可这时涂景元却將算盤一摆弄，吡出两排黃牙笑了几声說：“你穿了东家的衣服，又歇了这些天工，还欠着錢呢！”干了一年倒欠他的錢！我一气病更重了，他們見我死也不認賬，就天天到我叔叔家逼債，最后硬把叔叔打了一冬的柴禾賴了去。

我常常納悶，为什么老是受地主老財的欺負，难道是我

人小力單嗎？因此我也和父親一樣，盼望自己早些長大。十七歲那年我到地主王春芝家扛整活了。那時，我叔叔已經搬到常家園子去了。上工時我和地主說：“我只一個人，要在你家過年。”他滿口答應。王春芝長了一雙老鼠眼睛，滿臉橫肉，他的老婆胖的象頭豬，還有一個兒子在外邊上學。他家有廿二畝地，全叫我種，只在農忙時僱個短工。他們倆個人整天躺在家里吃吃喝喝，什麼活也不干，我還要給他們做飯、喂牲口。為了找個落腳的地方，我只好忍氣吞聲，起早睡晚，拚死拚活地干。一年過去了，糧食入了倉，牲口草也鋤完了，到了年三十，王春芝就翻了臉，氣兇兇地沖着我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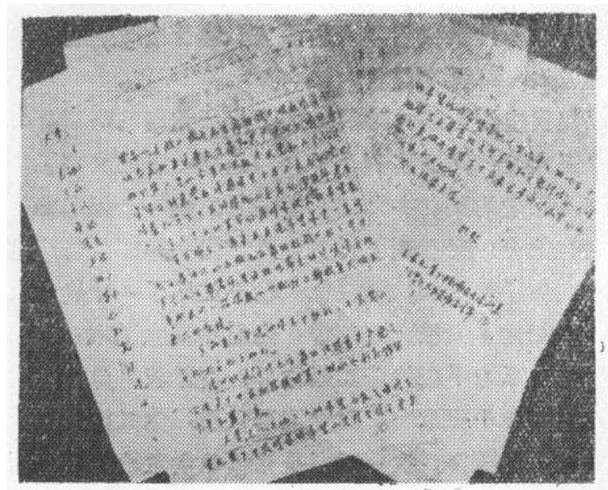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祖上有規矩，外邊人不能看見我家的香火！”一脚把我踢了出來。我氣炸了肺，別人正在過着團圓年，我却一個人孤單地流浪村頭。在這大年三十晚上，我望着滿天風雪，憤憤地想到：“為什麼我們窮人這樣苦？為什麼財主們這樣毒？我往哪里去？哪里才是我的路？”

正在我走頭無路的時候，來了共產黨和八路軍。乡亲们說：“王大奎，你可熬到頭了。”是啊，從此我翻了身，走上了窮人應走的路。一九四七年三月我第一個報名參了軍，經過黨的教育，我看到了天下窮人和我一樣都受苦，這是階級的苦。為了給階級弟兄報仇，我不過盡了一個戰士應盡的責任，黨却給了我極大的榮譽，先後給我立了六次大小戰功，還授予軍的甲級戰鬥模範稱號，獎給我“勇敢奮鬥獎章”、“艱苦奮鬥獎章”。建立空軍以後，黨又給我這個長工的儿子插上了翅膀。這一切都是黨和毛主席給的啊！因此，我認真讀毛主席的書，他老人家的每一句話都吸引着我，給了我巨大的鼓舞。我總感覺學得很差，可是沒想到一九六四

年五月，領導上叫我給全空軍師以上幹部毛主席著作集訓班去作匯報，首長們給了我極大的鼓勵，還把我的學習體會登在報紙上，把我的照片登在畫報上。更沒有想到，我這個在舊社會不如一頭牛的人，被同志們選為空軍毛主席著作學習積極分子。

十三年前，我的父母親在政府的幫助下又團圓了。原來，我父親當勞工時幾乎被折磨死，幸而解放了才逃出虎口，回到了家鄉。叔叔也入了黨，被選為貧協主席。他們都過着幸福生活。過去的長工，現在才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。

毛主席啊！全中國每個勞動人民的幸福，都和你連在一起啊，全世界每個勞動人民的解放，也和你連在一起啊！我一定要永遠跟着你走，把自己的一切獻給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。



王江同志解放前在黑龍江省海倫縣王貴屯當過四年長

工。这是王貴屯貧下中农协会全体代表給王江同志写的信，信中說：“我們分別十八年了，都很想念你。大家一直記着你受苦受罪的童年，我們都是一个藤上的苦瓜。你千万要記着貧下中农的囑託，把枪桿握得紧紧的，永遠不忘階級斗争，永遠跟着党和毛主席”。

苦 难 的 童 年

七一六三部队飞行中队長 沈 炳 芳



在黑暗的旧社会，我們浙江流傳着一首民謠：

“月儿弯弯照九洲，
几家欢乐几家愁；
几家高楼把酒醉，
几家流浪在街头。”

这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泪控訴，也是我苦难童年的悲惨写照。

我的家乡在浙江的余杭县，一家四口人，原有六亩薄地，活着靠它养命，死后靠它葬身，爸爸妈妈成年累月在泥

里滾，土里爬，勉强过着半飢半飽的日子。就在一九三三年我剛出生的時候，家鄉發了大水，反動政府只管要捐要稅，哪管人民死活，不久稻苗全淹死了；爸爸為了搶地，沒黑沒白地去車水，也連累帶餓病倒了。他全身黃腫，不能下床。這時旁親鄰家家揭不開鍋，媽媽求借無門，只得咬咬牙走進了“沈家大院”。地主沈友壽咀上笑嘻嘻地說：“遠親不如近鄰，我不能見死不救嘛！”心裡卻打好了黑算盤，他拿出二十塊大洋，但要二畝半地作抵押，月利三分。媽媽明知這是條死胡同，可為了治好爸爸的病，為了我和姐姐能活下去，不得不把這筆閻王債背回家來。那年臘月就滾到了四十塊，交不上利息，只好再押地，不到三年，全家仅有的六畝命根子地，就全讓沈友壽霸了去。爸爸悲痛交加，病上加病；我們只得靠着討要墊補日子。一天清早我們出去了，還不到中午，見我堂兄喘吁吁地跑過來說：“炳芳他爹……死了。”媽媽拉着我們趕回了家，爸爸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可憐他臨死前都沒有吃上頓飽飯。母子三人撲在爸爸的屍體上哭得死去活來。

從此，我家沒了土地，又沒了爸爸。媽媽只好抱着我，領着姐姐，



开始了討飯生活。我那年两岁，这样的年龄，財主家的孩子正笑盈盈地学着：“爸爸亲”，“媽媽抱”，而我学会的第一句話却是泪汪汪地叫喊：“大娘，大爷，給碗剩飯吧！”人家都說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为了找条生路，我們孤儿寡母就流浪到了杭州。

杭州有美丽的西湖，有舒适的別墅，有一排排漂亮的餐厅，摆着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，可那都是給洋人、官僚、財主准备的，我們連想也不敢想啊！杭州是富人的天堂，穷人的地獄。我們这些“臭叫化子”，只能躲着警察，穿街走巷，挨門乞討。那些闊老闊太們見了我們老远就捂上鼻子，厌恶地瞪几眼，不高兴时还要辱罵一頓。我們一天到晚常常空着肚子，嚼点野菜，喝口湖水，能討着点殘羹剩湯吃就算最大的幸运了。夜里我們就露宿在难民成群的菜市場，这里又黑又冷，臭气熏天，蒼蝇蚊子飞成团，人一躺下就扑一身，第二天醒来，衣服被露水打湿了，渾身叮出一片片紅包。

那时我不知什么是“暖”，什么是“飽”，到了五岁还不知道什么叫“过年”。就是那年冬天，我連冻帶餓，病倒在一个小破船里。姐姐急得直哭，哄着我說：“阿芳，今天过年啦，你乖乖等着，媽兴許能給你討点肉来。”說着他們抬起籃子走了。“过年，吃肉”，我等啊，盼哪，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，迷糊过去了。“弟弟！”“阿芳，你睜开眼看看媽媽。”媽媽以为我死了，抱起我来搖着，我睜开眼一看，天已經漆黑了，便問媽媽：“媽媽，討来的肉呢？”媽媽一听，眼泪立时滾落在我的臉上：“傻孩子，富人怕破財，过年連口剩飯湯都不給啦。”我一听，“哇”地哭了，姐姐也哭了。这时財主們酒足飯飽，欢天喜地，我們却空着肚子用



泪水辞别了旧岁。
可是，迎来的仍然
是一个又一个的血
泪年。

杭州实在呆不
下去了，我們又流
浪到了嘉善。十冬
臘月我还只披着件
爛夾襖，媽媽見我
光着屁股冻得直打
哆嗦，用稻草給我
編了个圍裙，可是，
这哪能擋住刺骨
的寒风啊。一位好
心的大媽見我实在
可憐，便找出件破
棉襖来給我披上，

我們全家感激得流出热泪。我活到八岁，这是第一次穿上棉襖啊。不久媽媽病倒在牛棚里，我只得拿起飯碗和姐姐分头去討要，串了几个村子，走了多少人家，才討来一碗稀粥。我很餓，但想到可憐的媽媽，一口也沒舍得喝，双手捧着这碗粥，一步一步走回牛棚。媽媽問我：“你吃了嗎？”我忙說：“我不餓。”媽媽看看姐姐：“阿珍……。”姐姐忙扭头避开了飯碗：“媽，你快喝吧。”这一碗殘湯，你推我讓，誰也舍不得喝一口，母子三人热泪盈眶，半天都說不出話来。媽媽突然把泪一抹，掙扎着站起身來說：“到哪兒

也沒咱旁人的活路啊，走，咱回家鄉！”七年的討飯生活就這樣過去了。

回到家鄉還是一無所有。媽媽只得去給人家划船賣苦力，可是，一雙手哪能養得起三張咀呢？聽說東洋人在海寧開了個繅絲廠，來鄉下招童工，媽媽便含着淚對姐姐說：“阿珍，去吧，在家都得餓死，你去學點手藝，也好有個飯碗。”姐姐那年才十一歲，她痛哭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抱着求生的希望，流着眼淚同我們告別了。哪知道姐姐走的不是一條生路，而是一條死路啊。

殺人不眨眼的東洋老板，為了榨取中國人民的血汗，把幾十個童工塞在一間十米見方的“鴿子房”里，天不亮就用鞭子打起來，喝上幾口鹽水煮的霉米粥，然後趕到滾燙的鹼水繅房洗蠶絲。姐姐的個子還沒有機器高，做工時還要墊個板櫈，一干就是十幾小時，稍喘口氣兒，監工的皮鞭就劈頭蓋腦地打下來。姐姐從小身體虛弱，再經這種折磨，不到一年，就再也爬不起來了。東洋老板硬說她得了傳染病，非要把她活活燒死不可。幸被幾個同伴，冒着生命危險救了出來，懇求一位拉糞的老船公，把姐姐送回了余杭。我和媽媽把姐姐抬到家，她一動不動地躺



在那里。“姐姐！”“阿珍，我苦命的孩啊！”我們扑到她身上，哭着，喊着，姐姐睜开深陷的两眼，枯黃的臉上滲出豆粒大的汗珠，她掙扎着張开干裂的咀唇，但一句訣別的話也沒有說出來就嚥气了。媽媽幾次哭昏過去。我心里擰上了疙瘩：“为什么富人这样狠？为什么东洋人这样坏？”

姐姐一死，媽媽更加少言寡語了，老人家每天頂着星星到鎮上去搖船。我孤独一人在家里割点草，拾点柴；每到掌灯时候，看看財主家炊烟上房了，就跑到河滩上去等媽媽。夏夜去等，冬夜去望，每次見了媽媽心里多高兴啊。媽媽帶回来几把蚕豆，那怕半夜，也要給我做一頓吃，可是有时媽媽兩手空空，我們只得餓着肚子回家。一次我餓得躺在床上哭起来，媽媽心疼，出去給我討来半碗粥，我几口就喝光了，还一个勁的舔着空碗，舍不得放下。媽媽流了一夜泪，第二天天不亮，又拖着疲憊的身子走了。

就連这种飢一頓飽一頓的苦日子，国民党反动派也不讓过下去。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的一天傍晚，媽媽看看太阳落山了，心里惦记着我，就急忙搖船回来，哪知道半路上遇到了一伙国民党散兵，硬逼着她去西凤祥运貨，可是到了西凤祥，这帮傢伙上岸搶东西去了。媽媽一看：“这不是土匪嗎？”就赶紧把船搖了回来。媽媽怕这些坏蛋寻事报复，从此再也不划船了。

在那万惡的旧社会，穷人就沒有个活路。我媽媽是一个勤勞善良、心灵手巧的劳动妇女，炕上地里的活样样拿得起，她的刺綉和裁縫手艺在全村数一数二，可是却养不了兩張咀。媽媽为了沈家有条根，費尽了心，受尽了累，才用泪水和汗水把我养到了十二岁，这时不得不求亲告友，把我送